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城与邑的演变

城与邑是两种不同的聚落形态，邑的历史更加久远，城是从邑发展起来的，自城产生以后，城与邑同时存在。夏、商、西周时期，城少邑多，邑是基本的聚落单位，分成不同的等级，绝大多数没有城墙。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邑筑起城墙，城与邑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到了城邑不分、城邑并称的程度。秦汉时期，很多郡县城是从原来的城邑演变而来的，并保留了一些上古时期邑的原始形态。从邑到城的转化，是聚落形态不断发展的产物，随之而变的是血缘关系越来越弱化，地缘关系越来越强化，并导致了上古社会形态由万国—王国—诸侯国—帝国的嬗变。

一 夏商西周时期的城与邑

夏、商、西周三个朝代又称三代时期（约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771 年）。城的出现很早，大约从公元前 26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有城墙的新型聚落^①。这种聚落，当时称谓何名，现已不可考证。晚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有“𡩺”或“𡩻”字，《说文》曰：“墉，城垣也。”在西周金文中“城”的写法是：在“墉”字右边加一“戍”字旁，即执戈守卫城垣之意。《说文》：“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由此看来，商代这种新型聚落称之为“城”，至汉代释之为“郭”^②。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92 页。

② 《说文》段玉裁注：“郭今以为城墉字。”释墉为郭。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世纪出版集团 1988 年版，第 298 页。

从“墉”和“城”象形字所表达的意义看，当为城郭及其他守卫设施，与上述所说的具有城墙的新型聚落是对应的。

《诗经》中有很多关于“城”的记载。《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郑风·子衿》：“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大雅·文王有声》：“筑城伊臤，作丰伊匹。”《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表明城是有城垣、城阙的。在《诗经》和《左传》等记载中，城一般为名词，但也用作动词，即筑城之意，如《大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大雅·蒸民》：“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随着筑城运动的兴起，《左传》中出现了大量用作动词的情况，如城向、城楚丘、城鄆、城郢、城诸、城郢、城郢、城费等。

邑是一种很古老的聚落形态，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环壕聚落，就是邑的一种形态。甲骨文和金文字形相同，均写作“𡩗”或“𡩚”，为上下结构，上有一“口”，下有一跪坐的“人”，强调邑为有人居住的地方或区域。因此，《释名·释州国》谓：“邑……邑人聚会之称也。”宋镇豪把商代的邑分为四类：商王都、方国的都城、官僚贵族的领地和分属王朝、臣属诸侯或方国管辖的邑^①。无论是王邑、诸侯之邑，还是众多的小乡邑，虽然都称为邑，但它们的等级是不一样的。王邑或大邑可以称为国，因此《说文》曰：“邑，国也。”林沄先生指出：“实际上只有都邑可以称国，在修辞上以邑代国的场合，通常都可以把邑理解为暗指国都的。”^②文献中常见的“敝邑”即指自己的国家。一般的邑及众多小邑仅表示居住的地方而已。《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甲骨文中未见这一区分，学界一般认为，这只是西周晚期“正名”的产物。况且，成周称邑，有宗庙；殷墟称大邑商，也发现了宗庙建筑，且有祭祀的遗存。可见，有无宗庙并非邑与都的区别所在。唐际根、荆志淳从考古遗存入手，对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的形态进行了研究，认为“‘大邑商’是殷墟众多商邑构成的商王朝都邑。‘大邑商’包含众多的小型商邑，但本身又可以理解为独立的‘邑’，因其此种特征，故称‘大邑商’。虽然‘大邑商’包含众多的小型商邑，但并不能将它理解为众多商邑的简单相加。作为都

① 宋镇豪：《关于商代“邑”的区划形态的考察》，见五井直弘编《中国的古代都市》，汲古书院1995年版。

② 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邑，大邑商本身俨然又是一个整体。它所包含的小型商邑，在空间、功能、血缘关系上都是相互关联的”^①。

关于邑字之上的“口”，多数人释之为城墙，认为邑是有城墙的聚落，但也有人认为“口”为沟树之封，邑是无城墙的聚落。甲骨文中有很多“作邑”的卜辞，郭沫若释“作”为“丰”认为是“封”字的异文^②，此解更接近“作邑”之本意。《周礼·地官》记载，大司徒之职“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郑玄注：“沟，穿地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王国维说：“古封、邦一字，封乃古人之经界。”^③最近有学者指出，三代时期，“邑”与城郭的概念区别严格，邑有沟树之固，但并无城的痕迹^④。目前，在殷墟、周原、丰镐、洛邑等地，的确也没有发现城墙的遗迹。

邑的原始形态是有沟树之封的聚落，三代时期城与邑并存，但二者的空间形态是有区别的，城有城墙，邑没有城墙。这一点在文献当中是有反映的。《左传·僖公五年》记载：“陈轅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劝之城其赐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孙不忘。吾助子请。’乃为之请于诸侯而城之，美。遂潜诸郑伯曰：‘美城其赐邑，将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左传·襄公七年》：“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上述两邑是在他人的劝说下才筑起城墙的，在此之前，仍保留邑的原始形态。

邑人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聚族而葬者。《韩诗外传》说，邑人“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崔）成请老于崔，崔子许之。偃与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丁乙先生根据周原发现的青铜窖藏认为，这些青铜器分属南宫氏、裘氏、微氏、虢季子等家族，窖藏附近发现的宫殿遗址应是西周晚期诸姓贵族的聚居^⑤。根据《礼记·王制》记载：“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又《春秋左传·春秋序》贾公颜疏：“诸侯有大功者，于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似乎可以将上述发

① 唐际根、荆志淳：《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考古》2009年第9期。

② 郭沫若：《释封》，《甲骨文字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王国维：《史籀篇疏证》，《王国维遗书》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④ 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⑤ 丁乙：《周原的建筑遗存和铜器窖藏》，《考古》1982年第4期。

现看作是在天子京畿之内的贵族封邑。

就整个三代来说,考古发现的城址只有十数座而已,不但不能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而且较史前时期也相差许多。而此时有关邑的记载却比比皆是,似乎说明这时是邑兴盛的时期。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与邑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上又称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随着春秋时期争霸战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邑筑起了城墙,如上所举城向、城楚丘、城鄆、城郛、城诸、城郛、城郛、城费等等,均在原邑的基础上筑起城墙。《左传·哀公七年》载:“宋人伐之(曹),晋人不救。筑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钟、邛。”筑城于邑的现象极为鲜明。时至战国,那些较大的邑,不但有了城墙,而且成为诸侯国的辖邑或郡县。战国时期的名城大邑,更是成为诸侯国的国都。燕昭王派乐毅伐齐,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乐毅围二邑,期年不克,及令解围,各去城九里而为垒。”燕昭王死,子惠王立,以骑劫代乐毅,齐将田单以火牛阵破燕军,“齐人杀骑劫,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叛燕,复为齐”^①。莒和即墨为齐国的属邑,都筑有坚固的城墙。邑演变为后来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是由战国时期秦国开始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通过“集小乡邑聚为县”的办法,将原来的小邑集中起来,形成三十一县,并设令、丞管理^②。原来的小乡邑不一定有城墙,但集中起来的县,则毫无疑问已经有城墙等防御设施了。这个过程直到汉代还在进行之中,《汉书·地理志》载:“龟池,高帝八年复龟池中乡民。景帝中二年初城,徙万家为县。”自春秋以来,县、邑、城几乎不分彼此,并可连称,有一些虽称邑,但实为城。《礼记·檀弓上》:“国亡大县邑,公卿大夫士皆厌冠,哭于大庙。”又《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秦相穰侯东行县邑。”《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君时,东周的河南、洛阳、穀城、平阴、偃师、巩、缑氏七邑入于秦,实际上皆为有城之邑。

邑有高低之分,也有大小之别。《论语·公冶长篇》有“十室之邑”、

①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周纪·卷四》,台湾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页。

② 《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2页。

“千室之邑”，《国语·齐语》称管子制鄙“三十家为邑”，《左传·成公十七年》载“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战国策·赵策》有“万家之邑”。从记载看，春秋时期，较大的邑设“宰”管理。如《左传·襄公七年》：“南遗为费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晏子曰：“在外，不得宰吾一邑。”国君或宗主赏赐臣子或宗子，少则几邑，多则几十邑，甚至百邑。纳邑也经常作为贿赂当权者或战争中胜利一方的手段。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陈桓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这些邑可能就是贵族的采邑或食邑，小邑根本就没有城墙。

由于战争和商业交往等原因，那些人口多，交通方便，地理位置重要的大邑，不但空间形态发生了变化，由原来无城墙的原始聚落变成有城墙的城邑，而且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居，变为主要以职业来划分的里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曰：“在田曰庐，在邑曰里。”里有两种形态，一种在城邑之内，一种在城邑之外。城邑内的里是邑内居民血缘关系被打破的产物。据孙敬明对齐国出土陶文的研究，战国陶文中“某邑某里”，如“城阳邑□里”、“蔓阳邑□里”等，为城邑外的里；陶文中仅称某里者，如东、西酤里，多为城邑内的里^①。城邑内的里正是邑的内部结构发生改变的反映。《管子·大匡》载：“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可以看出，当时城邑之内的居民大体上是以职业来划分居住区的。

三 秦汉时期的城与邑

秦汉时期指秦代、西汉、新莽、东汉四个时期（公元前221至公元220年）。这一时期的郡县城基本上是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邑城，而且很多还保留了邑的名称，如安邑、粟邑、枸邑、阳邑、临邑、襄邑、昌邑、石邑、堂邑、马邑、平邑、武邑等。《汉书·地理志》有大量某城故为某邑或故为某所封的记载。如：“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商，秦相卫鞅邑也”；“祁，晋大夫贾辛邑”；“长子，周史辛甲所封”；“朝歌，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孟，晋大夫孟丙邑”；“叶，楚叶公邑”；“郢乡，楚郢公邑”；“费，故鲁季氏邑”，等等。邑者，国也。《汉书·地理志》中所载，某城故为某国，亦属此类。“新丰，故骊戎国，秦曰骊邑”；“潞，故潞子国”；“须昌，故须昌国”，等等。汉

^① 孙敬明：《齐陶新探》，《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0页。

代的一些县城,虽然无“邑”字,但也属于邑城,如居延、敦煌汉简中所见到的临汾邑、降邑、雍丘邑、阳翟邑、郟邑、鄢陵邑、郾邑、颍阳邑、西华邑、穰邑、涅阳邑、宛邑、冠军邑、舞阴邑、瑕且邑、馆陶邑、胸邑等^①。这些都是在原来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县城。还有一种设在皇帝陵墓附近的陵邑,如秦始皇骊邑、汉高祖长陵邑、惠帝安陵邑、文帝霸陵邑、景帝阳陵邑、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宣帝杜陵邑等,也是与县相当的行政单位。

除了县级行政单位的邑之外,秦汉时期还存在其他性质的邑,如王侯将相所封的食邑,皇太后、皇后、公主的沐浴邑,皇帝祭祀山陵的祭邑。这些也是从古代的食邑制度继承而来的。这些邑大小不一,大者跨县连郡,小者仅为乡邑、亭邑。如惠帝崩后,吕太后称制,以其兄子酈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乃割临淄东园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淄川作为祭祀奉邑^②。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③。西汉时王子侯的封地,一般都是在父王的封地中划分,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以后更是如此。东汉王国的封地大为缩小,为了不影响嫡子对王国封地的继承,有时王子侯的封地,也是从他郡划入的。东汉时期王子侯的分封,有的称县侯,有的称乡侯,有的称亭侯。王与列侯皆有封土,列侯以下,均无封土,而有食户。户数多寡不一,功高者封为万户侯,少者仅百户。《续汉志·百官志》:“关内侯,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以户数为限。”除西汉早期之外,封邑不论大小,邑主只有经济上的食封特权,无政治上的治民权,封地全在原来的朝廷的郡县地域之内,直接治理者为郡县官吏^④。

上述食邑、奉邑、沐浴邑等,均不是一级独立的行政单位,也并不一定有城墙建筑,因此不在我们的地方城邑研究之列。还有一些军事城堡、关城、乡聚,甚至一些村落也建有城墙,但因其规模小,性质单一,也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里所说的秦汉城邑,既包括秦汉都城,也包括郡国城和县、邑、道城等作为郡县行政单位的地方城邑。一些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城址,虽然不是汉代的郡县城,规模也仅相当于内地的城堡,但是,考虑到周边地区的政治与地理原因,我们也将它们纳入到秦汉地方城邑的研究之中。

① 冯小琴:《居延敦煌汉简所见汉代的“邑”》,《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汉书·高五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01页。

③ 《汉书·外戚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63页。

④ 柳春藩:《东汉的封国食邑制度》,《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

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时期城内普遍设市,但城与市的结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在城内的地位不高,直接将城称为“城市”者也很少。《诗序·定之方中序》载:“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始见“城市”之语。《汉书》中不见“城市”连称。《史记·赵世家》中仅有一条记载:秦攻韩,韩国欲以“城市邑十七”入于赵,以此嫁祸于赵。此处,城、市、邑三者并称。《后汉书》中有四条:一是《刘玄列传》载:“更始悦,乃悬莽首于宛城市。”此处应指宛城之市。二是《法雄列传》载:“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三是《方术列传》载:“常居先人冢侧,未曾入城市。”四是《西羌传》载:湟中月氏胡“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脍,羽书日闻”。可见,自东汉之后,“城市”连称才逐渐多起来,秦汉时期并不流行。本书尽量使用当时通称的“城邑”之名,但考虑到现在人们的习惯性称呼,有时也将秦汉城邑称之为城市。

第二节 有关秦汉城邑的历史文献

秦汉都城为一代人文荟萃之地,相关文献记述十分丰硕。赋是汉代的主要文学形式,以写景状物为主题,其中不少汉赋就描写了秦汉都城的情况,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蜀都赋》、《甘泉赋》,班固的《西都赋》、《东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繁钦的《建章凤阙赋》等。虽然多华丽夸浮之词,但都是两汉之人描述其亲见之物,为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秦汉城邑提供了重要信息。

在历史记载方面,现知最早的是汉人辛氏的《三秦记》,专记秦汉都邑、宫室、苑囿地理。成书于东汉末年的《三辅黄图》,“博采秦汉以来,宫殿门阙楼观池苑在关辅者著于篇”,专记秦汉都城的建设情况,尤以汉都长安为主,对长安城及其周围的布局、宫殿、馆阁、苑囿、池沼、台榭、府库、仓廩、桥梁、文化设施、礼制建筑等记载详备,是研究古代都城,特别是西汉长安城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可惜这两部秦汉时期的地理书早已佚亡于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经过后人多次补缀、修订的辑本,其中有相当多的讹夺。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虽然以北魏佛寺的兴废为主题,但对东汉洛阳城的布局情况也多有旁及,是研究东汉洛阳城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也对秦汉都城作了专门的记述。此外,还有西晋陆机的《洛阳记》

和潘岳的《关中记》、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清代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和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等描述都城的书籍，其中《历代宅京记》上起伏羲，下迄元代，缕缕细述，自成一家之言，书中的《关中》和《洛阳》两篇，浓墨重彩，尤为精致。

与京城相比，描述秦汉地方城邑的专著很少，但历史文献当中涉及较多。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很多当时各地的城邑情况，成为今天研究秦汉城邑的基本资料。此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司马彪的《续汉志·郡国志》，既收录了汉代诸侯国的王城及郡县城，也注明了这些城的前后沿用情况，对研究秦汉城邑的位置及沿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北魏阚骧的《十三州志》，以汉代版图内所设司隶、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十三州为纲，系统介绍了各地的郡县沿革、河道发源及流向、社会风俗等情况，可惜此书已散佚，现仅存辑本。北魏时期另一部重要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详细记述了全国一千二百多条河流所流经的山岳、丘陵、陂泽的地望，以及重要关塞、郡县、城邑的地理情况和建置沿革，所以这部有关河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可以称之为部城邑地理学论著，但由于自然变迁，河流改道，亦不可完全据此稽考城址的名称。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杜佑的《通典》，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书，都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考察了前代城邑与当时郡县城的对应关系。宋元以后的地方志对各地秦汉古城记载较详，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尤其是清代学者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分代论述，各代均列史略和都邑考两项内容，史略介绍历史背景，都邑考考证了都城及各郡首县地理的位置与郡国变化，其中秦汉城邑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另外，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虽仅记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亦不失为研究该地区秦汉城邑的重要参考资料。

上述著作作为秦汉城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秦汉城邑的沿革及与当时城址的位置关系，对研究秦汉城邑的名称及性质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历史资料具有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它们以记述城邑的历史沿革为主，很少涉及城邑的形制和内部结构等问题，给我们提供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其次，历史学家所依据的史料难免有讹误，地理学家所参照的河流也常有改道，这些都影响着考证的准确性；再次，历史地理学家即使亲临城址考察，在不具备考古知识的情况下，也可能对城址的性质和名称产生误判。因此，仅仅依靠文献记载研究秦汉城邑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自20世纪之初，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主要手段的中国考古学兴起

之后,秦汉城邑考古获得了大量的资料,提供了更多的历史信息,为秦汉城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因此,以考古资料为主,以文献资料为辅,进行考古学研究,不失为秦汉城邑研究的一种新的途径和思路。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秦汉城邑的 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

秦汉城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秦汉城址。秦汉城址的考古发现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正值中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之际,英、法、俄、日等国的探险家,在中国境内的周边区域进行探险及非法的考古活动,大肆盗掘中国境内的古代遗址和墓地,攫取大量的珍贵文物。在此过程中,一些汉代古城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如楼兰古城、尼雅遗址就是这时被发现和盗掘的^①。日本学者除了在东北地区对集安高句丽古城进行调查以外,还深入到中国内地,对陕西西安汉长安城进行调查^②。20世纪30、40年代,伴随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再次掀起了对高句丽城址、墓葬的调查和盗掘活动^③。

国外探险家在西北地区的调查与盗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也激起了国内学者的不满,并促成了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同外国学者一起,对西北地区的古代遗址进行科学考察,因考察内容包括不少汉代城址,可以看作中国学者野外调查秦汉城址的发端^④。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考古发掘与研究人员都十分匮乏,而且主要集中于夏商周三代,秦汉城址的调查与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这方面所做的调查仅是零星的,研究也是支离破碎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各地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各考古机构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其中涉及到许多秦汉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其次,是对全国

① A. 杨建新、马曼丽编著:《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B. 见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图》之“古代边境线的发现”和“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现的东西”两章,中华书局1946年版。

② [日]足立喜六著、杨鍊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0—62页。

③ [日]原田淑人等:《牧羊城》,东亚考古学会,1931年。

④ 黄文弼:《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见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6页。

文物进行调查摸底。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国文物大普查,发现了一大批秦汉城址,这些成果陆续发表在学术刊物及全国文物地图各省分册上。再次,近三十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多的秦汉城址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遗址保护的形势十分严峻,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大遗址保护,对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秦汉城址的调查与发掘就是其中的任务之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的秦汉城邑考古,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配合基本建设的调查与发掘 (20 世纪 50—60 年代)

1950 年,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部分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负起全国主要文物点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各地也相继成立了文管会,负责本地区的文物调查与抢救性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全面展开,考古工作亦刚刚起步,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调查与发掘主要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考古队员对那些“妨碍”经济建设的地上城址进行调查,并对建设中发现的遗存进行抢救性清理。

都城方面。确定了秦都咸阳城宫殿区的位置,并试掘了一号宫殿遗址的一部分^①。1956、1962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 1977 年起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在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设立考古工作队,专门负责西汉长安城和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为以后两汉都城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阶段,主要探明了汉长安城 12 座城门的位置、城内的街道、宫殿区的分布和城西建章宫的大致范围,并发掘了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以及城南辟雍遗址和其他礼制建筑^②。探明了东汉洛阳城大城城垣、门阙、街道、城壕的位置以及宫城、金墉城、永宁寺、城南“三雍”遗址的大致范围,并发掘了城南东汉时期的刑徒墓地^③。其中,最主要的收获是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和汉魏洛阳城南郊刑徒墓地的发掘。

①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 年第 6 期。

② A.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 年第 5 期;《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考古通讯》1958 年第 4 期。

B.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第 2 期。

C. 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7 期。

③ 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 年。

地方城邑方面。调查发现了一批秦汉城址。20世纪50年代,在秦汉都城周围调查发现了秦汉栌阳城^①、雍城等遗址^②和汉河南县城遗址^③。在新疆、内蒙地区相继调查了一批秦汉边城,如:新疆奇台汉疏勒城^④,内蒙古达拉特旗城塔村古城^⑤、卓资土城村古城^⑥、宁城古城^⑦、呼和浩特美岱古城^⑧、呼和浩特十二家子古城^⑨、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⑩、磴口麻弥图古城^⑪等。“雁北文物勘查团”还对西北地区的古迹进行了调查^⑫。

20世纪60年代后,各地考古工作相继展开,调查和发现了一大批秦汉城址,有的还做过小规模试掘,其中以河北、山西、北京、山东、江苏和湖北等地所做工作较多,主要有:河北武安午汲古城^⑬、怀来大古城村古城^⑭、磁县讲武城^⑮,北京房山芦村古城、房山长沟古城^⑯、窦店古城^⑰、周口店蔡庄古城^⑱,山西万荣汉汾阴故城^⑲、汉临汾

① 《西北地区古迹名胜文物的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都栌阳城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第1期。

③ A. 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号。

B.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一九五四年秋季洛阳西郊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5期;《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④ 《新疆考古概述》,《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

⑤ 《达拉特旗城塔村古城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

⑥ 张郁:《卓资县土城村古城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⑦ 张郁:《内蒙宁城县古城址的调查》,《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⑧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59年呼和浩特郊区美岱古城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

⑨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十二家子古城出土的西汉铁甲》,《考古》1975年第4期。

⑩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土城子试掘纪要》,《文物》1961年第9期。

⑪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磴口县陶生井附近的古城古墓调查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7期。

⑫ 文化部文物局:《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7期。

⑬ A. 《省文物发掘组试掘武安县午汲古城》,《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

B. 孟浩、陈慧、刘来城:《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发掘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⑭ 安志敏:《河北怀来大古城村古城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

⑮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磁县讲武城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

⑯ 冯秉其、唐云明:《河北省房山县古城址调查》,《文物》1959年第1期。

⑰ 刘之兴、周桓:《北京市周口店区窦店土城调查》,《文物》1959年第6期。

⑱ 王汉彦:《北京市周口店蔡庄古城遗址》,《文物》1959年第5期。

⑲ 杨富斗:《山西万荣县发现古城遗址》,《考古》1959年第4期。

县城^①、夏县禹王城^②，江苏赣榆汉利成县城、东海东安县城^③，湖北宜城汉宜城县城^④，山东邹城“纪王城”、滕州薛城、滕城^⑤等。此外，湖南^⑥、福建^⑦和青海^⑧等省也调查发现了零星的汉代城址，武夷山城村汉城还做了小面积试掘，揭开了该城址长期发掘的序幕。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考古工作是调查多，发掘少；资料报道多，综合研究少，人们对城邑的认识大多停留在记录和描述上。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长安城礼制建筑的形制和用途上^⑨，也涉及汉长安城附近的渠水故道的考察和复原^⑩。边城考古带动了对边城防御组织和汉简的研究^⑪。在“古不下三代”的学术传统下，秦汉城邑还是以其存量多、保存好进入了考古学界的视野，并成为秦汉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 以都城为重点的调查与发掘（20 世纪 70—80 年代）

“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考古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秦汉城邑的调查与发掘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起，在第一阶段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秦汉都城的城墙、城门和宫殿进行重点发掘，

-
- ①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襄汾赵康附近古城址调查》，《考古》1963 年第 10 期。
 -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考古》1963 年第 9 期。
 -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海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4 年第 1 期。
 - ④ A.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调查》，《考古》1965 年第 8 期。
B. 石泉：《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江汉学报》1963 年第 2 期。
 -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 年第 12 期。
 - ⑥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衡阳、长沙、宁乡、澧县、石门等地调查》，《考古》1959 年第 12 期。
 - ⑦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 年第 10 期。
 - ⑧ 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考古》1959 年第 7 期。
 - ⑨ A. 许道龄：《关于西安西郊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是明堂或辟雍的讨论》，《考古》1959 年第 4 期。
B. 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 年第 9 期。
C. 王世仁：《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推测》，《考古》1963 年第 9 期。
 - ⑩ 黄盛璋：《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考古》1962 年第 6 期。
 - ⑪ 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考古学报》1964 年第 1 期；《玉门关与玉门县》，《考古》1965 年第 9 期。

都城考古逐步展开,都城布局成为研究重点。这时考古工作已经不单是为了配合基本建设的需要,而是根据研究需要,进行有计划、有学术目的地钻探与发掘。陕西省和咸阳市也在秦都咸阳城遗址设立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对重点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地方城邑仍以调查、试掘为主。同时,伴随战国都城的发掘,秦汉郡国城考古也取得了初步进展。

都城方面。秦咸阳城重点发掘了一、二、三号宫殿遗址,并对一号宫殿遗址进行了复原研究^①。刘庆柱先生根据考古调查的情况,对咸阳城的大致范围进行了研究,并对宫殿区、手工业区、墓葬区的分布情况作了分析^②。王学理先生也对咸阳城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③。袁仲一先生通过对出土陶文的研究,对秦咸阳城陶器制造业的性质进行了分析^④。但是,自此之后,秦咸阳城的考古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学术界对其大城、宫城及其形制布局等许多问题至今不明。

汉长安城考古进入有计划有重点的发掘时期。此时,考古工作重点围绕未央宫展开,先后发掘了未央宫官署遗址、西南角楼基址、前殿A区、椒房殿、武库遗址^⑤、长乐宫一号建筑遗址。探明了未央宫遗址的范围和形制,包括天禄阁、石渠阁、沧池和未央宫南、北司马门的位置,并在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内钻探出若干干道遗迹,为判明三宫的布局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时期还勘探了东、西市遗址,确定了两市的地望、范围,究明了其布局形制。汉长安城宫城遗址的探查及宫殿遗址的发掘,为解决其布局结构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资料,也使汉长安城的考古学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⑥。20世

① 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秦咸阳宫第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② 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

③ 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 A. 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B. 刘庆柱:《秦都咸阳遗址陶文丛考》,《考古与文物丛刊》1983年第2号。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年第4期。

⑥ A.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第4期。

B. 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第7期。

C. 刘运勇:《再论西汉长安布局及形成原因》,《考古》1992年第7期。

纪 80 年代还对汉长安城周围的陵邑、离宫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①。根据考古成果,陈直和何清谷先生先后为《三辅黄图》作注^②。刘运勇先生的《西汉长安》、刘庆柱先生的《长安春秋》等著作系统介绍了汉长安城的建制与文化^③。俞伟超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讲义中首次绘制了汉长安城的平面复原图^④。

汉魏洛阳城考古可分两个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发掘了南郊的汉晋辟雍、太学、灵台和明堂遗址。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首先,探出北魏外郭城的东、西城墙,结合 20 世纪 60 年代发现的北郭墙,推断北魏洛阳城确实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外郭城。其次,通过对汉魏洛阳城大城城墙的试掘,证明在汉至晋代洛阳城下,至少有三个不同时期、不同规模的古城叠压在一起,从而解决了汉魏洛阳城的历史沿革问题^⑤。再次,发掘了北魏建春门遗址、城墙马面遗址,钻探出郭城的大道和部分漕渠^⑥。段鹏琦先生还对城市周围的河流开发和利用进行了专题研究^⑦。但是,由于历史上许多王朝在此建都,城址的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加上考古工作有限,人们对东汉洛阳城的了解仍然不够深入。

地方城邑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也取得了较大进展。调查与发现的城址主要有:黑龙江宾县庆华古城^⑧,吉林集安高句丽城址^⑨、梨树二龙湖

① 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2 期;《汉云陵、云陵邑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4 期。

② A.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B.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A. 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B. 刘庆柱:《长安春秋》,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④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战国秦汉讲义》,内部铅印本,1973 年。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 年第 3 期。

⑥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 年第 4 期。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 年第 9 期;《北魏洛阳外郭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 年第 7 期。

⑦ 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⑧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宾县庆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第 7 期。

⑨ A.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 年第 1 期。

B.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 年第 1 期。

C. 王承礼:《吉林、辽宁的高句丽遗迹》,《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6 期。

古城^①，辽宁新宾黑沟山城^②、宁城外罗城^③、丹东暖河尖古城^④、建平西胡素台古城、扎寨营子古城^⑤、新宾永陵镇古城^⑥，河北怀来沮阳古城^⑦，内蒙古准格尔广衍故城^⑧、磴口临戎、三封及麻浑故城^⑨、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⑩，宁夏盐池胸衍故城^⑪，陕西韩城秦夏阳故城^⑫、凤翔南古城^⑬、临潼栎阳故城^⑭、华阴华仓城^⑮，山西朔县朔州古城（秦汉雁门郡马邑城）^⑯，河南扶沟新汲故城^⑰、荥阳汉王城、楚王城^⑱，山东苍山柞城故城^⑲、五莲折泉故城^⑳，江苏扬州汉吴国故城^㉑、泗洪东汉徐县故城^㉒，安徽宿县蕲县故城^㉓，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㉔，四川荣经严道古

- ① 四平地区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6期。
- ② 抚顺市博物馆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第2期。
- ③ A. 冯永谦、姜念思：《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
B. 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宁城县文化馆：《辽宁宁城县黑城古城王莽钱范作坊遗址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 ④ 曹汛：《暖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第6期。
- ⑤ 李宇峰：《辽宁建平县两座西汉古城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2期。
- ⑥ 徐家国：《辽宁新宾县永陵镇汉城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11期。
- ⑦ 张家口考古队：《河北怀来官厅水库沿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8期。
- ⑧ 崔曙：《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 ⑨ 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
- ⑩ 李殿福：《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 ⑪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文物》1988年第9期。
- ⑫ 呼林贵：《陕西韩城秦汉夏阳故城遗址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 ⑬ 秦晋：《凤翔南古城遗址的钻探和试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 ⑮ 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B. 杜葆仁：《京师仓当与西汉京师仓》，《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 ⑯ 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
- ⑰ 河南省博物馆、扶沟县文化馆：《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 ⑱ 张驭寰：《汉王城、楚王城初步调查》，《文物》1973年第1期。
- ⑲ 刘心健、刘自强：《苍山柞城故址发现铜印等文物》，《文物》1984年第8期。
- ⑳ 潍坊市博物馆等：《山东五莲张家仲岗汉墓》，《文物》1987年第9期。
- ㉑ 纪仲庆：《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文物》1979年第9期。
- ㉒ 李锦山：《关于东汉徐县的地理位置》，《文物》1982年第8期。
- ㉓ 安徽省博物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文物》1978年第8期。
- ㉔ 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城^①，新疆若羌楼兰古城^②等。

上述城址多数为调查资料，进行局部发掘者很少，直接影响到秦汉城址的深入研究。栌阳城遗址经过细致钻探，探出了城址的范围，城墙和城门的位置，城内道路及一些建筑遗址等，对了解其布局具有很大的帮助。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引起了学术界对其年代和性质的讨论^③。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幅地图，上面标有长沙国南部八县的位置，为研究南方县城的分布提供了很好的资料^④。这时期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墓内壁画保存较好，有汉宁城、繁阳县城内外城垣、城门、衙署、谷仓等形象，也为研究当时的县城形制提供了形象资料^⑤。侯仁之、俞伟超先生结合汉朔方郡县城的考察，对乌兰布和沙漠古今环境的变迁进行了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少数因战争破坏太甚而废弃不用，多数经过修补改造，作为秦汉时期的郡县城或诸侯国的首府。相对来说，这些城址保存较好，考古工作较多，如邯郸赵国故城^⑥、临淄齐国故城^⑦、曲阜鲁国故城^⑧等，使我们对其形制变化有所认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及秦汉都城的考古成果，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85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对中国古代城市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⑨。王仲殊先生对两汉和北魏都城进行了阶段性总结^⑩。俞伟超

① 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荣经水井坎沟岩墓》，《文物》1985年第5期。

② 新疆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③ A. 蒋炳钊：《对闽中郡冶及冶都县地望的一些看法》，《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B. 吴春明：《崇安汉城的年代及族属》，《考古》1988年第12期。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1期。

⑤ A.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1期。

B. 黄盛璋：《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4年第1期；《再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的地理与年代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C. 李逸友：《和林格尔壁画墓所反映的东汉定襄郡武成县的地望》，《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⑥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区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⑦ 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⑧ A. 田岸：《曲阜鲁国故城勘探》，《文物》1982年第12期。

B. 张学海：《谈谈曲阜鲁国故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文物》1982年第12期。

⑨ 中国考古学会主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⑩ 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

先生也对先秦至明清时期的都城规划问题进行了探讨^①。虽然,这个时期的学术视野仍然集中在秦汉都城方面,但是,一大批地方城邑的考古调查,为日后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 都城与地方城邑的考古与研究并举(20世纪90年代至今)

这一阶段,都城考古发掘面积扩大,都城的布局与形制问题成为学术热点。地方城址发掘数量增多,城址发掘报告陆续出版,个别地方城邑的布局也被考古揭示出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各省文物地图集陆续出版,报道了大量的地方城邑资料,秦汉地方城邑成为秦汉考古及秦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考古工作的增加,都城布局和内部结构更加清晰。虽然秦都咸阳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是研究工作却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一书,总结了以前的考古成果,对秦都咸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作了全面的研究^②。刘庆柱先生对秦都咸阳城的布局形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③。徐卫民先生对秦都咸阳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④。

西汉长安城的发掘工作可分为宫城考古及手工业市场考古两部分。宫城考古重点发掘了桂宫一、二、三、四号建筑基址^⑤,其次还发掘了未央宫二号基址^⑥,并对北宫遗址做了勘探,解决了其年代、地望、范围等长期以来的学术悬案。手工业市场考古主要发掘了位于西市范围内的陶窑遗址、冶铁遗址^⑦和位于北宫南面的砖瓦窑址^⑧,这些发掘使人

①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

② 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B区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期;《汉长安城桂宫三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期;《汉长安城桂宫四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期。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二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8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1992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9期;《1996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7期。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北宫的勘探及其南面砖瓦窑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0期。